

# 新质生产力何以助力文化治理

文丰安

【摘要】 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也赋予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崭新动能。数字化背景为探索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文化治理问题提供了科学向导和战略引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结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切实完善和创新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文化治理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仍需完善和加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仍有待提高、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需与时俱进、专业人才保护机制不足以及文化治理机制仍需完善等现实问题和瓶颈。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主体、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等形式和手段，为文化治理提供新动能、新思路、新理念和新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文化治理；数字技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24) 04 - 0067 - 09

## 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研究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sup>①</sup>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重要特征，有助于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关键性进展中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生产力跃迁为基本特征，着重体现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更加契合高质量发展所需的高质量、高效能、高科技的关键动能。新质生产力不仅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着力点，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崭新动能。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呼应，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具引领性、导向性、方向性和综合性的组成部分。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关系到国运兴衰，而且直接影响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博弈。文化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中华文明和传统基因的当代价值、提高国民精神生活品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的导向性作用。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作者简介】 文丰安，重庆社会科学院教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400020。

①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第4—8页。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和文化强国建设的相关论述及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战略安排和科学指引。将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事业及产业治理，对于解决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而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sup>②</sup>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培育和转化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把握如何做大做优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问题、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重要的理论遵循和现实指引。因此，在把握两个大局的战略全局高度，以及在当今全球数字发展赤字、世界逆全球化明显加剧的新形势下，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中国当前解决数字发展困境的新思路，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的新创见。同时，各国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态势。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如何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增强国际话语地位和国家软实力、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创新文化治理观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效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胜利，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探索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文化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亦成为具有重要意义学术主题。此前的新质生产力和文化治理相关研究概况如下：

其一，对新质生产力与文化治理内涵的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文化治理现代化及创新发展对于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探索数字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文化治理模式和观念创新将是一种全新的主题研究，也是对传统官本位观念的一种巨大挑战。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路径探析中，必须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和文化治理的基本内涵。有学者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新质跃升。”<sup>③</sup> 邓玲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蕴，主要体现在‘人才引领’‘科技驱动’‘产业赋能’‘高质量发展’等密切联系，相互形构的新生产力观上。”<sup>④</sup> 有学者认为：“自文化治理思想从西方引入我国之后，学界学者将文化治理总结为文化治理领域、文化治理工具以及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框架下，文化治理逐步从文化政策到行动。”“其治理特征可以概括为治理内容具有嵌合性、治理对象模糊、治理过程动态化和治理主体网络化。”<sup>⑤</sup> 学界主要存在两种阐释角度：一是从宏观或微观角度对文化治理划分并侧重领域、对象和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从政治、社会、经济等角度区分其属性并关注实际效果。<sup>⑥</sup> 概括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化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即文化与经济是同生同构关系。文化治理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因此，以新质生产力为主线探索其为文化治理赋能、助推其治理模式、路径及思路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二，对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分析。文化治理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环节。同时，文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国家治理体系整个系统中，文化治理主要针对是文化领域，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各个部分相辅相

①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党建》2023年第11期，第4—5页。

② 本报评论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华日报》2024年3月10日，第1版。

③ 胡莹、方太坤：《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39—51页。

④ 邓玲：《习近平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蕴及时代意义》，《学术探索》2024年3月11日网络首发，<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3.1148.C.20240308.1239.002.html>，2024年3月24日。

⑤ 祁述裕、闫烁：《数字时代文化产业治理新特点与繁荣文化产业新思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21—29页。

⑥ 肖波、宁蓝玉：《中国文化治理研究三十年：理论、政策与实践》，《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42—52页。

成、相得益彰。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我国在文化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如治理主体、治理思路、针对场域和手段方式等均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和结构性转变。然而,结合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现实问题分析,在文化治理方面仍存在若干窘境亟待解决。有学者从文化治理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扩展角度分析,数字网络发展在变革人民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网络空间话语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及互联网企业责任缺失和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陷阱等现实挑战。<sup>①</sup>从“文化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具体现实形态出发,社区文化治理之城市书房建设只是强调在外延式的扩展,对其功能拓展、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等内涵式发展仍有提升空间。<sup>②</sup>从市域治理角度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博弈问题,“中国40多年的城市发展伴随着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或迎面相遇,或暗地相争,不仅影响市民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选择,还左右着市域文化政策的倾向及文化产业的布局等。”<sup>③</sup>

其三,对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研究。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深层、最持久、最核心的力量,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和赓续作用。如何赋予文化治理新方式、新思路、新动能,我们亟须从治理模式、顶层设计、时代机遇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结合学界对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首先就要保证文化安全。部分学者从文化安全角度指出,“维护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树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sup>④</sup>概括来说就是,保证文化安全的前提就是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做大做强,同时文化自信又是文化安全的重要条件,因此,既要增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感、自豪感,还要保持文化健康,这样才能在开放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增强免疫力和自信心。也有学者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角度指出,公共文化治理应着力创造和不断提高文化供给品质,使公共文化服务增强人民精神力量。<sup>⑤</sup>从乡村文化治理中面对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和珍贵乡村文化资源日渐式微的困境,通过构建乡村文化的数字化资源体系,将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存储记录和创造再生,提高乡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率和使用率。<sup>⑥</sup>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角度,现阶段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加快文化领域改革和文化产品创新,主要是通过鼓励文化创新,推动数字化的文化体制改革;通过加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公共文化跨区域流动;通过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文化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文化需求。<sup>⑦</sup>

综上所述,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及文化治理的内涵、现实困境和路径探析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既有的学界探索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为本文进行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指引。但深入分析现有理论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大多数只是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与文化治理在各个视域下的治理现状作出基本概括和分析,对于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研究缺乏其逻辑视角的分析和探索,对两者之间有机结合的路径探析少之甚少,这也为本文探索其路径留下了理论和现实空间。基于唯物史观视角,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为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基于我国对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布局和科学安排,以及对提升我国综合竞争软实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部署。同时,结合当今数字时代背景,为探索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提供了科学向导和战略引领。深刻剖析“新质生产力”与“文化治理”之间的逻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文化治理现代化既时机吻合,又同频共振。因此,探索以关键核心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全新研究价值。

① 席琳:《网络空间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基本思路及实践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2期,第268—273页。

② 马洪亮:《社区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城市书房内涵式发展研究》,《图书馆》2024年3月12网络首发,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031.G2.20240208.2127.022.html>, 2024年3月24日。

③ 闵学勤:《市域文化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2期,第35—37页。

④ 辛向阳、吕耀龙:《从七大思维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1期,第30—40页。

⑤ 黄意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中州学刊》2023年第12期,第70—76页。

⑥ 滕翠华、姜雨彤:《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求知》2023年第12期,第33—35页。

⑦ 文丰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探索》2023年第4期,第151—163页。



## 二、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创新的竞争。”<sup>①</sup>也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sup>②</sup>着眼于国家对新质生产力和文化治理的战略部署及当前我国所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既要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被打断，又要探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的新思路。基于以上战略安排和数字时代背景，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为内核，切实完善和创新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理论角度层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sup>③</sup>同时，也深刻论述了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sup>④</sup>列宁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这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归根到底，文化是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和政策的反映，经济与文化是同生同构的关系。实践角度层面，文化所蕴含的先进理念影响着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各个方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深厚性、深层次、持久性的支撑作用，以多维度、立体性积极地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文化治理的创新发展不仅有益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培育和转化新质生产力，还可以广泛凝聚起人民精神力量，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sup>⑤</sup>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要通过繁荣发展文化，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全体人民以高度自信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既时机吻合，又同频共振。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需的内核所在。

### （一）理论逻辑

从唯物史观层面，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sup>⑥</sup>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理论可知，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列宁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他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sup>⑦</sup>此外，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研究。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sup>⑧</sup>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表现形式，首先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体现。因此，基于相关文献和经典著作研究可以看出，经济与文化是同生同构关系，即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丰富程度，同时，不断完善发展的文化为经济基础提供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兴盛和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来源及核心势能，逐渐完善的文化繁荣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观念指引和能动促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无疑为文化治理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内核，强劲赋能文化企业、文创产业链、文化产业新业态及周边服务转型升级；反过来，文化治理现代化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力在质量、理念、方向和战略等方面的强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②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3年第3期，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⑦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 （二）历史逻辑

科技与文化，是文明的两翼。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既是一种成功经验，也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科学地确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不仅创造出了物质文明长期发展的世界奇迹，而且文明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协调性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科技、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sup>①</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sup>②</sup>文化和科技都是为满足人民需求的工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战略研判，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对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同时，大力推动先进科技手段助推文化领域改革及模式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效推动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中<sup>③</sup>，展现出中华民族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所具有的多元融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着重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突破口，着力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以推动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未来产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支撑助推文化治理模式、思路和观念上的新创见，进而推动文化产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

## （三）现实逻辑

一个国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不断解放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也要持续创新先进文化、丰富精神财富；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梦，既要雄厚的物质力量、经济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源泉、精神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作为国家治理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呼应，党和国家对文化治理进行系统部署和战略安排，致力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既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基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极大推动数字技术发展，也为文化领域结构性改革和传承创新提供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sup>④</sup>党和国家在深刻研判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重要安排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sup>⑤</sup>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部署了关于文化的八项重点任务<sup>⑥</sup>，将文化数字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依托“数字中国”战略，推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激发其当代价值和精神力量。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数字化时代的关键信息技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发展和转化开辟了崭新路径。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不断创新文化治理思路、模式和内核动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综上，“新质生产力”与“文化治理”的有机结合既时机成熟，又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就是，不断推进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实际、切实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

①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新湘评论》2020年第19期，第4—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1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张蕊：《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加强合作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7日，第1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1版。

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国家图书馆学刊》2022年第4期，第49页。

盾、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助力文化资源整合和塑造新型“软实力”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完善文化治理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科学赋能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精神境界和国民整体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 三、文化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sup>①</sup>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取得各项伟大胜利的精神源泉。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推动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在推进文化治理的实践中，概括来说文化领域治理依然存在以下现实问题和瓶颈突破口，即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仍需完善和加强、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仍有待提高、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仍需与时俱进、专业人才保护机制不足以及文化治理机制仍需完善等。深入剖析其原因有利于创新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以及以更加完善的文化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一）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需加强和完善

首先，在网络空间文化治理方面。网络文化凭借其自身补偿性、极端性和大众性等特征对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网络文化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网络文化产品品质较差和数量较低，具体归因于网络文化相关技术手段和条件的制约，还体现为网络文化需求与供应不匹配，整体内容和形式趋于娱乐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转化、整合和加工及供给的产品甚少。其次，意识形态领域管控仍需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的核心问题。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给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改变。因此，互联网平台、手机APP、QQ、微信、微博、抖音等媒体舆论平台建设和管控仍需加强。需对各媒体平台发布相关讯息中敏感词汇、图片、视频等内容监管，需结合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等算法进行管控和研判。最后，强化文化领域自信心和价值引领。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盛行，国内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同时也存在一些暗流涌动的错误思潮。因此，以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要强化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 （二）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性有待提高

文化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性在其现实力量上表现为以党建为引领，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治理。首先，参与文化治理的企业数量较少且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据《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23》数据，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数量超过7.3万家。<sup>②</sup>立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巨大和复杂性工程来说，不仅表现在文化企业、产业数量不足，而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力较低、资金投入不高、产业布局不合理、企业间数据流通和共享存在壁垒。其次，图书馆、文化馆等配置数量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出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重要作用。据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9个、文化馆3508个<sup>③</sup>，平均下辖省级行政区拥有公共图书馆约94.3个、文化馆约103.2个，对资源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并未充分挖掘其巨大价值。各类报纸、期刊杂志等发布的内容在传播效率和宣传形式上对文化治理具有一定延迟性，需完善电子期刊、电子报纸订阅、电视广播等媒介新形式。最后，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关注度和主动性不高。据统计，我国共有14亿人口，需扩展和完善社会组织、公民参与文化治理的平台和通道，不断激发社会多元主体治理的协同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我国人口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 （三）文化产业新业态需结合颠覆性技术来创新和强化

首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力不足。当前大多利用传统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物理存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发布》（实务版）2023年第9期，第3—8页。

② 统计年鉴网：《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23》，2022年11月12日，<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2024年3月24日。

③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第10版。



储,并未全面结合数字技术、XR、AR等高新技术进行数字资源库建设、归档、存储、转化和整合,并未充分激发其对文化领域进行艺术设计创新、强化现实交互、提升虚拟体验强大的数据支撑作用。应结合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虚拟现实技术再激活其当代价值。其次,文化领域新业态发展较缓慢。随着人工智能、AR等数字技术等迅猛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场景也应运而生,但发展缓慢且文化产品、文创产品等供给质量不高,应着力强化硬件技术的智能化和精专化发展。同时,在文化内容与服务方面需持续创新和多元供给,重组文化资源,促进其数字化转型。再次,完善文化产业有机新业态。文化业态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龙头文化行业,也需要对周边企业进行资源调度、渠道匹配、终端技术、人才培养等服务进行完善。最后,缺乏对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释放路径探索。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已有56项遗产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含众多联合申报的遗产点<sup>①</sup>,以及颇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交互体验感重视不够,且参观交互受制于时间、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并未充分激发其丰富的精神价值和导向作用。因此,应结合大数据、XR、AR等科学技术增强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接触的现实体验感和智能交互,充分激发新活力新势能。

#### (四) 专业人才教育资源配置、培养及保护机制需完善

首先,就业前景较差。在就业内卷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相关专业人才不仅受到学历层级、年龄、编制问题等方面的多重压力,还要综合分析未来职业规划、就业前景等现实状况,但综观各企事业单位、文化管理单位的人才引进政策和福利制度等,文化治理相关专业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其次,各高等院校的专业配置不均衡和吸引力较低,缺乏对教育、科技及人才的融合贯通和人才资源优势的激发。尽管各高校对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企业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科学布局,但由于就业形势及前景较差,导致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冷门专业,报考人数较少,高层次人才培养资源不足且相关专业人才储备量不能满足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再次,应完善对相关专业人才的保护机制。完善对文化领域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相关政策支持,加大对文化领域的吸引力和就业保障,加大对文化治理和管理人才、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推动以文化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逐渐形成日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最后,还需扩大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互鉴,加大和研发对相关人才跨国家、跨地区、跨学科的培养模式,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平台,同时应充分借鉴各国对文化治理的相关经验,积极引进高层次海外人才,为推动我国文化治理科技创新形成巨大合力。

#### (五) 文化治理机制需高效结合数字技术赋能升级

首先,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场景的治理机制应建立健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逐渐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网格化、去中心化、数据集成化为主要特征逐渐深入融合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及相关领域。对于文化治理、文化产业及周边服务来说在硬件技术上受到的冲击力前所未有的,这就亟须学习新的治理经验和逻辑机理,从而有针对性地在新的治理方向上创新治理思路和理念,提高文化产业的服务效能和质量。其次,文化治理的监督体系应健全完善。应逐渐形成基于数字技术、大数据、5G、6G等核心算法技术数据库,提升对数据收集、处理和整合的准确性、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还需不断提升文化治理平台数字化水平,畅通反馈通道,为文化治理效果提供多角度、全覆盖性、实时化、数据化的监督体系。最后,文化产业数字化需把握时机加快建成。在科学把握国家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的计划蓝图的基础上,加快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新业态及周边服务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库和服务平台的搭建,切实促进文化资源在各企业的数据畅通与资源共享。此外,还需探索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体旅游等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四、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的路径探析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最深层、最持久、最核心的力量,与时俱进地创新完善文化治理模式和思路对于传承创新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和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sup>①</sup> 李经龙、王海桃:《基于UGC数据的中国世界遗产景区网络关注度与满意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第8期,第138—150页。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sup>①</sup>在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有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活力、新发展、新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精神生活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精神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致力于实现文化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重要作用。探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新思路、新模式、新动能是具有全新研究价值的学术主题，上文深入剖析了“文化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逻辑，既时机成熟，又同频共振。文化治理本质上是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现状作出改善，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就是将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科学技术、数字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与文化产业各领域、各主体、各部分相结合，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加工和再创造，不断激活文化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因此，在上文深入分析现实困境的真正原因后，我们亟须从创新治理模式、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治理机制和时代机遇等角度进行路径探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在路径探索中积极寻求三者的集中体现和有机结合。<sup>②</sup>综上所述，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治理主体、文化产业培育和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等形式和手段，为文化治理提供新动能、新思路、新理念和新进展。

### （一）科技赋能强化党对文化治理的全面领导

首先，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切实解决网络文化需求与供应不相适应的矛盾关系，当前网络文化整体内容和形式偏向娱乐性。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和深入挖掘力度，提高网络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和内容品质。同时，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网络媒体深度融合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新形式展开对文化深层次、广领域、全方位的传播，“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出来。”<sup>③</sup>其次，强化和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研判和管控。在意识形态管控领域结合数字技术、大数据等强化对互联网平台、各媒体、宣传部门进行科学研判和严格审核，完善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机制。最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法治、诚信、数字技术等方面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精神文明工程和数字结合专项行动，努力营造全民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良好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 （二）智能平台激发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性

首先，充分激发文化企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要强化党和国家对文化治理企业主体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国家、政府和各级社会组织也要加大对文化企业进行文化数字平台建设和数据资源库搭建的转移支付力度。此外，不断发展壮大文化龙头企业，加大其对文化产业规模、资金投入力度和产业合理布局，强化与各企业公平竞争、有效合作和资源互享互通，切实推动文化产业新业态稳步前进。其次，扩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的数量和服务性能。既要扩大各地区对图书馆、艺术馆和文化馆的配置，也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积极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激发文化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新活力。此外，充分结合数字技术提高对传统文化资源整合转化功能，为文化产业业态创新和平台搭建强大数据库。最后，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平台。坚持“共建共商共享”的治理原则，充分激发我国人口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创新结合数字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搭建文化治理建议、咨询和监督平台机制，强化文化治理的全过程、深层次、多角度的协同性，提高治理水平和模式创新以及主动性、积极性。

### （三）充分结合数字技术创新文化治理思路 and 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sup>④</sup>首先，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力度。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大数据、AR等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文化数字资源库建设、转化和整合，为文化创新传承、艺术设计创新、现实交互提高、虚拟体验增强提供强大数据支撑。其次，应探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新业态增速提质为重要着力点。完善和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机制，提升文化产业软、硬件技术智能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2页。

② 文丰安、肖华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探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13—23页。

③ 刘海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红旗文稿》2023年第15期，第42—4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



和精专业化水平，培育壮大数字创意、数字艺术、视频等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助推文化产业形成“群雁效应”。同时，拓宽优化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机制，持续创新文化内容、重组文化资源和提高服务供给效能，促进文化产业数字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增强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互体验感。传统形式的治理模式并未激发出精神价值和导向作用。需结合文化资源库、数字技术、AR、XR等虚拟现实科技创新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互动，充分激发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助力实现其精神价值、新活力和新势能的充分释放。

#### （四）完善文化领域高精尖人才培养、引进和保护机制

首先，需强化顶层设计。在科学把握国家对“新质生产力”和“文化强国建设”战略布局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应完善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就业政策、福利制度和培育机制的政策支持，加大相关教育部门对相关专业的正确引导和吸引力。其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相关技能实验平台建设。基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科学统筹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资源配置、高精尖人才引进和高校培养基地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高效融合的先锋实验高地，切实培育和转化相关专业高精尖人才，有效提高优质人才储备的“质”和“量”。此外，提高对文化龙头企业进行数字资源建设重组和关键核心技术与文化治理融合机制的资金支持和资源调动，助力打造产学研高精尖人才培养基地一体化建设，逐渐形成日臻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最后，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治理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sup>①</sup> 创新对相关专业人才跨国家、跨地区、跨学科的培养模式，持续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同时充分借鉴各国对文化治理的相关经验，积极引进高层次海外人才，为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文化治理形成巨大合力。

#### （五）高效结合数字技术健全完善文化治理机制

首先，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新业态治理机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给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动能，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场景的快速崛起对文化治理来说是全新挑战。因此，既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相关治理经验，也要在深入分析数字技术特征和逻辑机理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形成数字网络治理结构，不断健全完善治理新领域多元协同性和效能。其次，完善文化治理监督体系。借助数字技术、大数据、5G、6G等高新算法，提高文化治理平台数字化水平和畅通监督反馈通道。通过人工智能便捷地汇集、整理和导出相关数据，减少非必要数据证明，健全完善数字文化治理基础设施和平台维护，为文化治理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最后，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加快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强化文化资源高效流通与共享。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博、非遗、旅游等传统文化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文化产业链转型升级，助力文化产业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助力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

###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sup>②</sup> 总之，文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全面性的巨大工程。结合当前国家对“新质生产力”“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探究以新质生产力助力文化治理，不仅可以助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取得新进展，而且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强，则国运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安全，则国家安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治理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断完善文化治理创新机制，加强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此外，充分结合数字技术创新完善文化治理模式、治理思路、治理路径，不断提高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主动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助力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责任编辑：潘纯琳）

<sup>①</sup> 《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第1版。

<sup>②</sup>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6页。